

北宋两刘牧再考

郭 彧

(华北油田 八处,河北 任丘 062552)

摘要:本文在笔者以前考证的基础上,又以读书所得新证据对北宋两刘牧的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证。并以考证结果为根据,对诸多已成“事实”进行了商榷,指出:三衢刘牧无任何易学著作存世;朱震等有关“河洛”图书的传承代次,全是臆说,不可再引以为据;“河洛”图书内容出于彭城刘牧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之后,很可能是其弟子窜入;范溥昌的“象学”并不讲“河洛”图书,以此溯及陈抟之“象学”亦非“河洛”内容;范氏晚于彭城刘牧,并非其师等。最后指出:彭城刘牧讲太极大道,理应在“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刘牧;三衢刘牧;彭城刘牧;易数钩隐图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2(2006)01-0627-07

On the author of Yi shu gou yin tu again

GUO Yu

(The Eighth Division, Huabei Oilfield, Renqiu 06255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uthor's former textual researches and new evidence, this paper sets forth new viewpoints on the issue concerning the two figures with the same name of LIU Mu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rom different angles. By the result from the latest researches, the paper reverses the accomplished conclusion and points out: (1) the LIU Mu from Sanqu had not written any works related to Yi; (2) the transmission pedigree concerning the *He tu* (River Diagram) and *Luo shu* (Luo Chart) mentioned by ZHU Zhen has no foundation and should not be based any longer; (3) the contents of *He tu* and *Luo shu* came out later than the one-volume *Yi shu gou yin tu* written by the LIU Mu from Pengcheng, so they most probably were supplemented by his disciples; (4) FAN E-chang's imagology does not relate to *He tu* and *Luo shu*. Traced back by this fact to CHEN Tuan's imagology, it should not relate to *He tu* and *Luo shu*, either; (5) FAN E-chang was born later than the LIU Mu from Pengcheng, so, the former was not the latter's teacher. Finally, the paper insists that the LIU Mu from Pengcheng who discourses the Dao (Way) of *Taiji* (Grand Ultimate) undoubtedly should be given a position in the studies of Song-Ming neo-Confucianism.

Key words:LIU Mu; the LIU Mu from Sanqu; the LIU Mu from Pengcheng; *Yi shu gou yin tu*

笔者曾在《周易研究》上发表《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一文,指出三衢刘牧(1011—1064,字先之,尚书屯田郎中)之前还有一位彭城刘牧(字长民,太常博士),并考定《中兴书目》所记《易数钩隐图》一卷,为前刘牧所撰。近来读书又得新证,兹详考之并商榷一些有关问题。

一、北宋的确有二位刘牧

证据之一:杨亿《武夷新集》之证

收稿日期:2005-01-20

作者简介:郭彧(1941—),计算机高级工程师,华北油田油建二公司退休干部。从事过中学教师、地震台技术台长、计算机程序员、教育督导等工作。1989年始专门从事易图学研究。迄今已发表文章20余篇,出版6部著作。

景德二年三月试草泽刘牧策二道(奉圣旨撰)

问化成之道,儒术为先,故大学之兴存于周礼,博士之设始于秦官,历代相沿旧章咸在,国家盛胶庠之制,崇俊造之科,镂版以广圣言,祭菜以严祀典,传经请益必选硕儒,讲肄宵筵咸稽古训,而公卿之子弟,鲜隶籍于成,均州里之俊髦,率登名于乡老,岂劝诱之未至,将沿袭之或殊,何以复杏坛槐市之规,遵小成大成之制,弦歌不辍,诞扬洙泗之风,生徒浸多,克追唐汉之盛,愿闻嘉话,用洽永图。

按《宋史》列传记,杨亿字大年,浦城人,太平兴国八年(983癸未)十一月为秘书省正字,淳化中命试翰林,赐进士第,天禧中官至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卒谥曰文。杨亿与寇准、王旦、毕士安等相友善,王禹偁、陈彭年皆其门人。景德四年(1007)八月,奉诏与王旦、钱若水等修《太祖太宗实录》。考景德二年(1005)杨亿奉圣旨撰试草泽刘牧策二道之事可知,彭城刘牧当于是年致仕为官,而是年恰是澶渊之盟后第一年,故《宋史》记“景德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讲和,大赦天下”。而三衢刘牧作《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时当庆历四年(1044),恰是澶渊之盟后四十年,故文中有“我国家以仁策驯有北四十年矣”语。按《浙江通志》所记,景佑元年甲戌(1034,宋仁宗在位)进士张唐卿榜上有三衢刘牧名,为官屯田员外郎。这就是说,彭城刘牧早在三衢刘牧前三十年就已为官。

证据之二: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二十七“官制”记之证

嘉佑定横行员数

唐开元中始置诸使,后增诸司使,以内侍或将军兼,天祐后用外廷臣卿监将军及刺史以上领之,国朝定内客省使,至合门使曰横班,皇城使以下凡二十曰东班,宫苑使以下凡二十曰西班,初犹有正官,后但以检校官为之。嘉佑三年八月,诏立定横行员数,客省引进四方馆使各一员,东西上合门使共二员,合门引进客省副使共六员,合门副使通事舍人共八员(又诏并增二员)。神宗建文阶而武选未易,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易横行新官,通侍大夫至右武郎十二阶,皇城使已下为武功,至武翼大夫八阶,副使以下为武功,至武翼郎八阶,六年十一月己未增为十三阶,亲卫至正侍大夫(郎亦如之,不置正侍,宣和官滥,横行至百十有八人)。宋朝文武无轻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学授文资者,若兴国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嶠,咸平三年钱惟演。有文臣以智略易右职当边寄者,若雍熙四年柳开,祥符九年高志宁,天圣元年刘平、四年刘牧,庆历七年杨畋,皇佑四年苏斌,治平二年种谔,三年种古及张亢、刘几、李丕諲之属。熙宁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换官法。

按此记,彭城刘牧原为太常博士的左职文官,于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以智略易右职当边寄”。此时三衢刘牧16岁,八年后方上进士榜。

依据上面两条证据,我们可了解彭城刘牧的大概情况:宋真宗景德二年致仕,官至太常博士,至宋仁宗天圣四年,以有智略而易右职,赴边疆任武官。

根据有关资料,我们可以把两位刘牧的活动情况排作下表:

宋真宗(998—1022在位)

景德元年(1004),北宋与契丹于澶渊立盟讲和。

景德二年(1005)春正月,大赦天下,三月,杨亿奉圣旨拟试《草泽彭城刘牧策》二道。(见杨亿《武夷新集》)彭城刘牧于是年为官。

天禧中(1019),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撰《易证坠简》一卷,《大易源流图》一卷,自谓其学出于湓浦李处约,李得之庐山许坚。(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

宋仁宗(1023—1063在位)

天圣四年(1026),彭城刘牧以文臣有智略,易右职赴边疆为武官。(见王应麟《玉海》)

景佑元年(1034),张唐卿榜(进士)有刘牧,三衢人,官屯田员外郎。(见《浙江通志》)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有《送三衢刘牧推官之兖州》诗作。(见范仲淹《范文正集》)

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语。(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又记:《易辨》凡二十篇,刘牧之学大抵求异先儒,穿凿破碎,故李、宋或删之或辨之)宋咸所谓“近世刘牧”,乃指彭城刘牧言。

康定元年(1040)七月十八日,石介作《泰山书院记》,有“今先生游,从之贵者,故王沂公、蔡二

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经略……门人之高弟者，石介、刘牧”语。（见石介《徂徕集》卷十四）又石介《上杜副枢书》中有“泰山孙明复先生其人矣，先生道至大，尝随举子于科名……执弟子礼而事者，石介、刘牧”语。此皆指三衢刘牧而言。

庆历初(1041)，彭城刘牧二传弟子吴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优诏奖之，田况为之序。（见冯椅《厚斋易学》所引《中兴书目》，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语）

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甲申，以泰山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见《宋史》）

庆历四年(1044)，三衢刘牧作《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有“我国家以仁策驯有北四十年矣”语。（见《宋文鉴》，又叶适《习学记言》曰：柳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能古文。又曰：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休。）

庆历四年(1044)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奏三衢刘牧掌机宜文字。十二月富弼罢出，刘牧赴建州。（见《宋史》，又梅尧臣《宛陵集》有诗：刘牧殿丞通判建州）

庆历七年丁亥(1047)，李觏，三十九岁，是年作《删定刘牧易图序》。（见李觏《盱江集》）

嘉佑七年(1062)，三衢刘牧除广南西路转运判官。（见《广西通志》卷五十一，秩官：宋广南西路转运使刘牧）

宋英宗(1064—1067 在位)

治平元年(1064)四月，三衢刘牧移荆湖北路，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牧，年五十四以官卒。（见王安石《临川文集》：《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治平中(1066)，叶昌龄撰《治平周易图义书目》二卷，以《易数钩隐图》之失，遂著此书，凡四十五图。（见王应麟《玉海》）

二、两刘牧之辨所涉及问题的商榷

宋晁说之曰：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有庐江范谔昌者亦尝受《易》于种征君，谔昌授彭城刘牧，而鞞隅先生黄晞及陈纯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景迂生集》）

宋王称曰：“初华山陈抟读易，以数学位穆修，修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学位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云，坚卢江人也。”（《东都事略》）

宋朱震曰：“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上周易表》）

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三卷，题“三衢刘牧撰”。

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著《易数钩隐图》。

四库馆臣《易数钩隐图》提要曰：“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宋刘牧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字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

《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七，衢州府志记：“刘牧，西安人，字牧之，登进士，终屯田员外郎，授易数于穆修，著《易解》与《易象钩隐图》，王安石志其墓。”

以上数说，可谓无一说得准确无误，究其本因就是对北宋有两刘牧之事未加考证。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记：“《易数钩隐图》二卷，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又为《略例图》，亦黎献所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历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略无一语及之，且黎献之序称字长民，而志称字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这就是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问之后，至今并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详加考证并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易学及宋明理学的著述中，凡涉及刘牧者，皆多引朱震之传承说，或多引黄宗羲之学案说。于是，诸如“黑白点河图、洛书的传承始于陈抟”、“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而画”、“范

谓昌为刘牧之师”、“《易数钩隐图》为三衢刘牧撰”等等，都成了铁定的“事实”。然而，我们考定北宋有两刘牧之后，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商榷。

1. 彭城刘牧没有得到河洛图书之传承

按《宋史》所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 癸未)冬十月甲申，赐华山隐士陈抟号希夷先生。按《东都事略》所记，陈抟于端拱二年(989)秋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彭城刘牧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致仕，其时陈抟已仙逝 17 年。按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所记，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天禧中人(1019)，著《易证坠简》一卷，序言称任职毗陵，因事退闲，又言得于湓浦李处约，李得于庐山许坚。按邵伯温《易学辨惑》所记：“明逸亦传陈抟象学，明逸授庐江许坚，坚授范谔(昌)，由此一枝传于南方也。”既然范氏自言得于湓浦李处约，这就是说并非直接得于庐山许坚，而“由此一枝传于南方”，则不知传于何人。《宋史》记，范谔昌著《大易源流图》一卷，今见《道藏·周易图》中有范氏《四象生八卦图》，其图列《说卦》八卦方位，四正卦上(离)、下(坎)、左(震)、右(兑)，各标有“火”、“水”、“木”、“金”字，并各有五空心圆点为数，中为一“中”字，坎数一、六，离数二、七，震数三、八，兑数四、九。图左的文字为：“范氏谔昌曰，四象者，以形言之则水、火、木、金；以数言之则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九、六、七、八。惟土无形，四象各以中央土配之，则是为辰、戌、丑、未之成数也。水数六，故以三画成坎，余三画布于亥上为乾；金数九，除三画成兑，余六画布于未上为坤；火数七，除三画成离，余四画布于巳上为巽；木数八，除三画成震，余五画布于寅上为艮，此四象生八卦也。”此图反映出范谔昌“象学”的内容，既然所谓“大易源流图”中有“四象生八卦图”，那么就是本《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节之义而演绎，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两仪生四象图”及“太极生两仪图”。这就是说，范氏所推“大易源流”，是说八卦由太极步步生来的，而不是说八卦源于“河图”或“洛书”。既然范氏有如此主张，那么他所传的“象学”就不会是“河图”与“洛书”之内容，以此溯及陈抟所传的象学，也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既然范氏之学传于南方，而范氏晚出，那么就不会传给其前之彭城刘牧。由此可知，范谔昌不可能为彭城刘牧之师，彭城刘牧并没有得到什么“河洛”图书之传承。

2. 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

我们本《中兴书目》所记，考定彭城刘牧原著《易数钩隐图》为一卷本，按其自序(见于《道藏·易数钩隐图》卷首，胡渭《易图明辨》、朱彝尊《经义考》亦引用之)，有“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等说，依此可知，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以自序对照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二卷，其所“钩隐”之图则是从“太极第一”至“七日来复第四十六”，其中并没有涉及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就此四十六图之前数图及其图说看，是下面的叙说过程：

《易数钩隐图》卷上：

太极第一(一〇图圆周边五白点五黑点，表示 1、2、3、4 之和 10)

图说：太极无数与象，今以二仪之气混而为一以画之，盖欲明二仪所从而生也。

太极生两仪第二(黑白点图，上一下二左四右三，天一天三为天仪，地二地四为地仪。卷下之《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即此图。)

图说：经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易》不云乎天地而云两仪者，何也？盖以两仪则二气始分，天地则形象斯著，以其始分两仪之仪，故谓之两仪也。何以明其然？略试论之。夫气之上者轻清，气之下者重浊，轻清而圆者天之象也，重浊而方者地之象也，兹乃上下未交之时，但分其仪象耳。若二气交，则天一下而生水，地二上而生火，此则形之始也。五行既备而生动植焉，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则知两仪乃天地之象，天地乃两仪之体尔。今画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画地右动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分而各其处者，盖明上下未交之象也。

两仪生四象第九(黑白点图,上七,下六,左八,右九。卷下《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即此图。)

图说:经曰“两仪生四象”,孔氏疏谓金木水火,禀天地而有,故云两仪生四象,土则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别,惟云四象也。且金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为象哉?孔氏失之远矣。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者,庄氏云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也。今于释卦之处,已破之矣。何氏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一也;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三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四也。今谓此四事,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称“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然则象与辞相对之物,辞既爻卦之下辞,象谓爻卦之象也,上“两仪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谓也。诸儒有谓七、八、九、六,今则从以为义也。且疏家以七、八、九、六之四象为“所以示”之四象,则驳杂之甚也,何哉?夫七、八、九、六乃少阴、少阳、老阴、老阳之位,生八卦之四象,非易之所以示四象也,略试论之。且夫四象者,其义有二,一者谓两仪所生之四象,二者谓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变化,上下交易,四象备其成数而后能生八卦矣。于是乎坎离震兑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举其四则五可知矣。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

四象生八卦第十(十黑白点图,八卦本《说卦》所言方位而布置,四正各三点,四隅乾三点、坤六点、巽四点、艮五点。卷下《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即此图。)

图说:五行成数者,水数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土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

这一叙说过程充分说明,一卷本《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而阐明其“象由数设”意图的。特别是谓“河出图,洛出书”为“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之一语,道破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之画与“河出图,洛出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那就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应该为《易》内之物,他便不会有如此相反之说。

从《易数钩隐图》前两卷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后人把有关“河图”、“洛书”、“龙图”等词窜入其中的痕迹。如《两仪生四象第九》之图说曰:“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其中“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十字,显然为后人窜入的文字。“斯则”所指为六、七、八、九四象数,合之为三十,与“四十有五之数”毫不相干。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彭城刘牧说“河出图,洛出书”非《易》内之物,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而是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

3. 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非全出于彭城刘牧之手

《中兴书目》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所谓“言数者皆宗之”,并非谓“言河出图者皆宗之”。从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的内容看,彭城刘牧主张“象由数设”,自太极生两仪至四象生八卦,皆以天地生成之数“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的确在当时自成一家之言,庆历初(1041)吴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奖之之后,言数者皆宗之也是情理中事。以倪天隐述其师胡瑗《周易口义》为例,仁宗时之胡瑗释《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时,则曰:“义曰:按此河图,是天之大瑞也。”于此可见胡氏并没有宗《易数钩隐图》下卷之说,以黑白点数之图释“河出图,洛出书”。至释“两仪生四象”时则曰:“义曰:言天地之道阴阳之气,自然而然生成四象,四象者,即木金水火是也。故上文谓天一下配地六生水,地二上配天七生火,如此之类,是天地阴阳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盖天地既判生为五行,然二气既分,则自然生而为木金水火,则地之道本于土而成,但言四象则土从可知矣。”及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则曰:“义曰:按此四象有二说,一说以谓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为之象,所以示也;又一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疏庄氏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则非也。又何氏以为天生神物圣人则

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亦非也。”于此我们却从中见到胡氏“宗之”《易数钩隐图》卷上之说的痕迹。

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尽刊王文,直以己意代之”语。此“近世刘牧”当指彭城刘牧而言,而三衢刘牧时当30岁,仍健在,宋咸不会针对三衢刘牧而有是语。又宋咸所辨是针对“《钩隐图》以画象数”,并没有辨什么“河洛”图书。以此推之,宋咸所见《易数钩隐图》,似当为彭城刘牧著之一卷本,书中并没有“河洛”图书的内容。一年之后,庆历初(1041)黄黎献弟子吴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此时已经是彭城刘牧赴边任武官15年之后(彭城刘牧是否健在,不可得而知之,以其再传弟子上其书于朝推断之,似乎有变)。为吴秘所献书制序之田况,字符均,其先冀州信都人,举进士甲科。赵元昊反,夏竦经略陕西,辟为判官。按《宋史》,元昊反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田况制序当在宝元与庆历间。又历六年,庆历七年丁亥(1047),李覯作《删定刘牧易图序》,存其易图者三:河图(“九宫数”戴九履一图)、洛书(合生数、成数二图为一)、八卦图(《说卦》所言方位)。由此可见,吴秘所进《易数钩隐图》不再是一卷本,其中已有今见三卷本卷下之“河洛”诸图。这就是说,此时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已经“颇增多诞漫”(李覯言,所见五十五图的《易数钩隐图》有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诞漫”)。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的易图四十六幅的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等图,诚如李覯所言,的确是“观之则甚复重”。“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既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既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既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既是卷上“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漫”,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乃是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本意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有“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蕴。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显然有悖于卷上原作者自序之初衷。

是何人增多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并加入所谓“河图”与“洛书”之图与图说?以彭城刘牧弟子黄黎献著有《续钩隐图》一卷的情况来看,似乎吴秘所进之书为合彭城刘牧原著与黄黎献之续著为一书。倘若如此,则“河图”与“洛书”(有“洛书五行生数”与“洛书五行成数”两幅图)的始作俑者,就是黄黎献无疑了。无论如何,“河图”与“洛书”诸图不出自彭城刘牧之书,这是毫无疑问的。

4. 三衢刘牧并没有易学著作存世

三衢刘牧(1011—1064)于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榜,累官至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王安石所作墓志铭谓其“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叶适谓其“当时号能古文”。今见其遗文有《待月亭记》、《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以上见《宋文鉴》)、五言排律《仙李洞》(见《广西通志》)。虽三衢刘牧于《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中有“在《易·复·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释者谓四夷为中国之阴,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闭关而却外,所以拟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阳长阴消之际,设备务速,明不可后时也。商旅不行,小人喻于利,亦防奸之谓也”之“易说”,然却没有专门易学著作存留于世。因而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针对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前有欧阳公序之《易数钩隐图》提出了疑问,曰:“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历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略无一语及之。”如果三衢刘牧果真著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颇有影响之《易数钩隐图》,那么深明易学之王安石怎么会作墓志时“无一语及之”呢?事实上,恰是从王安石所作《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中看出,《易数钩隐图》一书本不出自三衢刘牧之手。南渡后三衢刘敏士重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明注为其伯祖三衢刘牧撰,又伪造欧阳修之“序”,遂使见此书者误将三衢刘牧当做彭城刘牧,此则刘敏士之徒,实是引起后世之疑的肇

事者。前此《中兴书目》早已明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至南宋陈振孙始见刘敏士之刻本，因而《直斋书录解題》方有如此之疑问。

此误之传，愈传愈真，愈传愈广。至明道士白云霁撰《道藏目录详注》，除谓《易数钩隐图》三卷，《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卷，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外，又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亦“三衢刘牧撰”。实则此三书皆非“三衢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为彭城刘牧撰，《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原名《先儒遗事》，南宋郑樵《通志》记或谓陈纯臣撰，是书中有《易数钩隐图》中数幅图，刘牧岂能自称“先儒”？“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六经图》中之《易经》图总名（其它五经亦各有总名，分别是：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是书即不是三衢刘牧撰，也不是元张理撰，本为南宋杨甲撰，毛邦翰增补，叶仲堪重编之《易经》图版本。至清初，黄宗羲著《宋元学案》，于《泰山学案》中谓泰山孙复弟子三衢刘牧著有《易数钩隐图》及《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乾隆间四库馆臣亦深然白云霁之“详注”，《四库全书》提要中照样谓《易数钩隐图》与《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二书，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又误考白云霁之注，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元张理撰。

凡此数个历史之误会，皆会因北宋两刘牧之考定而有所澄清：三衢刘牧与一卷本及三卷本《易数钩隐图》毫无关系；朱震等所言“河洛”图书的传承代次，多是瞎说，不可再引以为据；华山陈抟及范谔昌所传“象学”，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出现于彭城刘牧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之后，很可能是其弟子所为。

三、应当为彭城刘牧在“宋明理学史”中存留一席之地

元托克托（脱脱）修《宋史》，列传中立“道学传”，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张栻、黄干、李燾、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等均列为立传。“道学”（后称之为“理学”）一词先见于《大学》第三章：“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周敦颐之所以被尊之为“理学开山”，是因其著有《太极图易说》与《易通》，于“宇宙论”及“体用论”等方面均有论述，而最终归结为义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其说以太极为万物化生之本源，“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以诚善为本，约之为大道。北宋五子皆讲“道”与“太极”（或“太虚”），或曰“道为太极”，或曰“太极一气”，或曰“自无极而为太极”，或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或曰“一气分而两仪判”，或曰“道即性也”，或曰“道无真无假”等等。彭城刘牧有“太极无数与象”、“两仪之气混而为一”、“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乃天地之象，天地乃两仪之体”等论说，亦是典型的宇宙生成论，并且早在周敦颐之前就已有是说。如此，我们梳理“宋明理学”时，就应当有彭城刘牧的一席之地，以彰显其先于“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启蒙作用。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当然包括“性与天道”。天道、地道、人道终归入太极大道。今存宋代易学著作中，是彭城刘牧首言“太极”并有一〇之图（先于周敦颐一〇太极之图），堪称有宋道学的先驱，我们讲“宋明理学”，理应从彭城刘牧始。

通过我们的考证得知，彭城刘牧不是先把“河洛”图书纳入书中的始作俑者，而是有宋首先申明“太极一气”，分而为两仪（天地之体），进而生成四象、八卦的道学家。为此，在“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中的，确应该为彭城刘牧存留一席之地。

2004年10月5日写于英国